

正义还是虔敬?

——《游叙弗伦》篇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

蒋 慧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通过分析《游叙弗伦》篇文本,探析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分析认为,民主制度造成了雅典城邦传统神学基础的崩解,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家追求城邦生活新的秩序的同时,开始面对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政治神学所主张的“神所指示的生活便是最好的”,与政治哲学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真理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造成了苏格拉底式的悲剧。

关键词:《游叙弗伦》篇;虔敬;正义;政治哲学;政治神学

中图分类号:D0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4-0089-04

在古希腊城邦中,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都是生活正义与否的评判者,并且各自主张自身角色的唯一性。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着“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的真理;政治神学则认为“神所指示的生活便是最好的”。对正义真理的追求和对神的指示的遵守造成了古希腊城邦中人们的角色冲突。古典政治学家在扮演正义真理追求者的同时,也就成为了古典政治习俗的批判者。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冲突在城邦生活中的表现,就在于哲学的生活方式与虔敬的生活方式之间难以消解的张力。在柏拉图的对话《游叙弗伦》篇中便充分展现了此种张力。本文着力对《游叙弗伦》篇进行文本分析,把握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角色冲突,从而揭示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的本质区别。

一、对话的主题:什么是虔敬?

《游叙弗伦》这篇对话应该是柏拉图的早期作品,对话的主题是关于虔敬这一神学的问题。由于苏格拉底被控诉的罪名是“不信城邦所承认的神,并且腐化年轻人的心灵”^[1],并且对话的场景恰恰是

安排在王宫门廊这样一个特定的场所,《游叙弗伦》篇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游叙弗伦》篇为苏格拉底拒绝雅典正统神学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辩护,而这似乎是为了完成《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不能完成的任务。如施特劳斯所说的,该篇揭示的仅仅是“部分真理”^[2],这篇对话并非是一个成功的对话,我们依然无从知晓苏格拉底关于虔敬的明确态度。但对“部分真理”的深入挖掘,仍然是我们不得不进行的尝试,以此探索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家对哲学和神学冲突关系的思考,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的追求。

虔敬问题主导了城邦共同体的形成,“并在城邦制度、礼法以及公共生活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以古代信仰为基础的城邦中,无论家庭生活还是共同体的生活,都有着一套稳定可靠的礼法秩序”^[3],但在民主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礼法制度已然动摇。苏格拉底、柏拉图必须思考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重建一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秩序。《游叙弗伦》篇实质上便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探讨,在这篇对话中既可以看到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冲突,又可以看到哲学家追求的统一秩序与雅典民主

收稿日期:2011-06-11

作者简介:蒋 慧(1981-),女,江苏徐州人,讲师,哲学博士研究生。

现实中的多元化主体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

二、对话场景的特定安排： 王宫前廊与游叙弗伦

一般认为,柏拉图的对话篇对对话的发生场景都有着特意的安排,如发生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关于“正义”的对话^[4]。《游叙弗伦》篇的对话安排在王宫前廊,这里是古希腊雅典主管宗教事务的王者执政官审理和判决案件的法庭所在地。这一地点的安排表明雅典古老的礼法秩序依然发挥着作用。当然对于官司缠身的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也正在此地才能相遇,从而进行关于虔敬甚或正义的对话。但是这篇对话中所反映的对话双方的主张和生活境遇表明,在当时所谓的民主派当政的背景下,主导雅典城邦生活的古老秩序已经开始崩解了。

对话的双方是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苏格拉底是来应诉的,而游叙弗伦是来指控自己父亲的杀人行为的。游叙弗伦家中的一个仆人杀死了另一个家奴,他的父亲命人将凶手缚住投入沟中,并派使者去请示神的意志如何处置凶手,但凶手在使者未回时已因冻饿而死。游叙弗伦似乎刚刚完成了指控,并且受到了公民的冷嘲热讽。在这篇对话中,我们能够发现游叙弗伦的诸多特征:自负狂傲、愚蠢无知、孤陋寡闻,这完全不同于格劳孔、阿德曼托斯等人。苏格拉底的对话分为2种类型:一是自愿的,同时也是跟朋友之间的谈话;二是非自愿的,跟非朋友甚至是一般民众的交谈。这篇对话是偶然的,更非自愿的^[5]。游叙弗伦是个年轻预言家,并且自认为对虔敬非常了解。而苏格拉底正因不敬神的问题被人起诉,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反感却将对话继续进行下去,并且在对话中试图劝服游叙弗伦放弃诉讼其父亲的主张。苏格拉底一直挑战游叙弗伦,让其说明自己指控父亲的行为在法庭上是站得住脚的,也是虔敬的。这意味如果游叙弗伦失败了,那么苏格拉底就证实了他无法赢得官司而只能放弃指控父亲。倘若游叙弗伦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人并不需要神的启示便能自觉,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

游叙弗伦很诧异苏格拉底在王宫前廊的出现,因为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并不会控诉别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是诧异的行为表明游叙弗伦是一个孤陋寡闻、不关心政事、不合格的雅典人。苏格拉底为游叙弗伦所作的关于公共诉讼的解释,更是让人觉得游叙弗伦是一个外邦人。或许不该问苏格拉底

“你到底上这儿来干什么?”而应该问问这位聪明的预言家“你到哪里了?”^[3]在游叙弗伦的诉讼中,他试图表达他对传统秩序的理解,并且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自以为是的行为会给整个城邦的秩序造成多大的影响。他是一个介于普通公民与苏格拉底中间位置的人物,他自视不同于常人,对虔敬的理解很深。“但是他这种对寻常技艺和德行的超越转向了某种有关神圣事物的伪知识,而苏格拉底则转向了哲学”^[2]。

对话的开场除了这2位参与者,还涉及到王者执政官、迈雷托士。王者执政官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未参加对话,并且也不可能参加对话。王者执政官是一个专管祭祀、听讼不敬神案子的执政者,在九大执政官里他是政治地位最低的。在诸王时代,君主拥有军事、祭祀、司法权威。而民主制度的实行使得古老的君主制度早已殆尽,关于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对话也才可能在王者执政官的地盘上进行。王者执政官作为法律的代表不参加这次对话也是必要的,因为法律是不容讨论和对话的,他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形式进行表达的。王者执政官的不在场在一定意义上为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向政治神学挑战提供了空间。

苏格拉底是被迈雷托士等3人起诉的。在游叙弗伦问起谁控告他时,苏格拉底对迈雷托士的描述也是颇值得玩味的。他说迈雷托士是没有名气的年轻人、“辟赛阿区人”、“长头发、寡须、钩鼻子”,并且对他作出赞扬:“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好像很有智慧的样子”。没有名气的年轻人恰恰与苏格拉底德高望重的老人形象相对比,这让我们很怀疑他控诉苏格拉底的动机。“辟赛阿区人”的称谓极尽反讽之味,其背后是民主破除了贵族祭司的等级制度,原先排除在宗教之外的人也得以进入祭司层,雅典从此便成为了一个平等的王国。在这个角度上看,如果将虔敬视作对祖先习俗的遵守的话,民主制便是“丧失了它原来所宣称的神圣基石”^[3],而“辟赛阿的迈雷托士”恰恰是民主制亵渎神灵的行为表现。对迈雷托士的赞扬,因游叙弗伦没有领会苏格拉底而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反讽。赞美之后,此话题似乎本应转向年轻人教育的哲学问题,但反讽的失败使得关于虔敬的对话得以继续深入。

三、关于虔敬的3个定义： 做神所喜、为神所喜与侍奉神

因为苏格拉底正好被迈雷托士控告不敬神,而

游叙弗伦表示他对虔敬的道理颇有认识,苏格拉底便希望成为他的学生,听取他的意见。在这篇对话中,探讨了有关虔敬的3个定义:做神所做的事情、为神所喜以及侍奉神。除了最终未能形成一个一致意见之外,与其他对话一样,这些定义都是由对话者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形成的。

在所有的3个定义中,只有第一个定义是最接近游叙弗伦的理解,后两者都是在苏格拉底一系列的思辨过程中促使其变更而达成的。游叙弗伦认为他诉讼父亲杀人的行为是对宙斯的模仿,但是他的主张忽视了他的经历与宙斯经历的差异,并且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游叙弗伦的行为所依据的是正统神学,但祖宗的习俗认为虔敬在于做神让做的事,而非做神所做的事。游叙弗伦的行为会使他对同是祖宗习俗的“儿子应当尊重父亲”要求产生困扰。第二,游叙弗伦将自己的行为视作是在模仿最正义的神——宙斯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他人为设立了一个关于正义的标准,以此标准对诸神进行了等级划分。这个标准肯定是独立于宙斯的,否则划分便毫无意义。既然宙斯的行为仅仅是对标准的遵守或模仿,人为什么直接践行正义标准,而是将对神的行为的模仿视作是虔敬呢?

游叙弗伦给出的第二个定义是为神所喜。问题是神与神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对深信诸神之间势不两立而争斗传说的雅典人来说,神的世界的分歧是显然的。既然诸神之间存在着意见的分歧,那么人应该服从于哪个神的偏好呢?诸神之间意见的分歧以及诸神不同意见的发表有先后次序,难以保持虔敬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虔敬不能作为一个标准,那么标准又应当是什么?这就给如苏格拉底般的哲学家对正义生活的探索提供了空间。或许我们可以探索一种多数神同意的决策机制,这似乎是人间民主制度在奥林匹斯山的投影。在民主派当政的生活中,古老的习俗已经开始崩解,城邦统一的参照系丧失,政治生活变得混乱。苏格拉底试图探索一种统一,这种统一本可以依赖于宗教,但是多神论的希腊神话并不能提供这种支持。苏格拉底不得不突破正统神学进一步探索在诸神之上的标准,而这种哲学的探索行为为正统政治神学所不容。他的这种探索引起了政治家、城邦民众的恐慌,遭到了“败坏年轻人的心灵”和“不敬神”的控告。

第三个定义是侍奉神,确切地讲是以奴隶照料主人的方式侍奉神。虔敬就是服侍的技艺,而对技艺的解释也会带来对虔敬定义的怀疑。倘若这种技艺类似于侍奉马或牛这样专业性的技艺,那么虔敬便是少数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这显然是不对的,而

且这样一种虔敬似乎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驯服神和控制神。倘若侍奉是为了给神带来好处的话,那么神能够从人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尽管游叙弗伦表示有很多,但是举不出一个适当的例子来。他做的仅仅是一种无力的补救。“一个人懂得祈祷和献祭,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让神欢心,那么,这些就是虔敬。这能保佑每个家庭,也能保佑城邦的公共生活。与此相反,若不能取得诸神的欢心,那么这些事情就不敬神,它会颠倒一切、摧毁一切。”^[3]由此,虔敬的问题便成了人与神之间的一场交易。于是讨论还是回到了第二个定义——虔敬就是为神所喜的问题,甚至还被迫承认虔敬就是一种交易。

游叙弗伦在这场对话中明显表现得不可靠,他自以为是的行为极有可能对家庭、城邦赖以存在的习俗虔敬观造成危害。苏格拉底知道他这一态度的危险性,所以一直维持着谈话,希望将其拉回习俗的生活方式上。另外,这篇对话解释的是一个“惹人恼的半真理”^[2],它揭示了政治神学中将诗人描绘的诸神故事作为基础的不可靠。从这篇对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正统政治神学的一种质疑又极力维护的矛盾心理,而这似乎是他同时扮演的城邦公民和哲学家2种角色之间的冲突。

四、虔敬与正义背后的问题——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冲突

正义与虔敬问题的背后实质上就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神话的对话和冲突。对于虔敬与正义的关系,苏格拉底的提问是:“是不是所有正义的事务都虔敬呢?抑或虔敬的事务都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务都不是虔敬的,只有一部分虔敬,一部分则不虔敬?”^[3]在苏格拉底举了2个例子说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之后,游叙弗伦表示虔敬的事务范围并没有正义那么大,虔敬只是正义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正义的不一定都是虔敬的”,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正义与虔敬无关,甚至正义的不是虔敬的。这个结论是震撼人心的,它以直白的方式表达了正义与诸神的关系——正义的事情可以是不敬神的。而城邦所赖以维系的这种敬神观念也很可能不是正义的,是不具备正当性的。那么何为正义呢?倘若诸神造成的错误真的发生,那么城邦的生活应当如何维持?关于这个问题,柏拉图似乎将答案安排在《理想国》那篇对话中。

雅典的公民们一般认为,城邦的习俗是由诸神指定的,信仰决定了城邦的结果,贯穿了城邦生活的所有环节。每个后代公民都应当坚守城邦的习俗,

与古代祖先的善保持原始的统一。而在祖先习俗支配的城邦生活中,宗教、政治、哲学是难以区分的:城邦中政府与宗教并不存在区分,所有的法律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因而每一个犯法的行为也就被贴上了“亵渎神”的标签。在这样的城邦氛围中,要成为一个虔敬者必当以法律为标尺,将自己附着于家庭和城邦。对家庭和城邦的世代罔替的忠诚使得他们不会非常认真地怀疑所继承来的习俗的善。“他越是虔敬,他的灵魂越是走向习俗要求和禁忌的‘内在化’。”^[3]而苏格拉底般的哲人则在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一种可以称之为“善”的生活,追求重新实现城邦和谐的统一的正义标准。这也就是张灏先生所谓的“超越的原人意识”^[6],古典哲学家通过超越内化,发现政治生活本质,以此奠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认同。政治生活本质的追求而非超越存在的意志是政治哲学家的目的,而将超越内化是轴心时代的技术手段,以为社会政治生活塑造统一的秩序。政治哲学是追求关于善的知识的,追求智慧的。但正统的神学观念告诉我们,祖宗过的生活便是善的、幸福的,我们只要继承或模仿就行了。所谓善的知识也都是神或祖宗赐予的,因此,政治哲学关于城邦正义的思考是一种犯法的行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冲突,而哲人与民众的关系往往被放大为对立的生死之战。

五、结 语

苏格拉底所面临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雅典城

邦的生活丧失了正义的古老标准。他需要摆脱那些虔敬者灵魂的束缚去探索对事物公正的看法。而这样的行为是城邦的民众所恐慌和不允许的,所以苏格拉底只能是被控诉判处死刑。在今天看来,苏格拉底的死,不仅是由于民主制度的缺陷抑或个人信念的强大,更是因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之间难以妥协的分歧。令我们不得不警醒的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这种冲突并未因近代世俗化而终结,将对方试图囊括其中的努力依然在持续,或许有一天新的“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还会上演。

参考文献:

- [1] John Burnet. Plato: *Euthyphro*, apology of Socrates and Crito[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 [2] 施特劳斯. 论《游叙弗伦篇》[C]//贺照田.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 [3] 柏拉图. 游叙弗伦[M]. 顾丽玲,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4]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5] 叶 颖. 知识与虔敬:《游叙弗伦》篇的政治哲学解读[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 [6] 张 灏.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 2 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Justice or piety?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theology in Plato's *Euthyphro*

JIANG Hu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al theology in Plato's *Euthyphr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makes the basis of the state traditional theology breakdown, that the political philosopher, fac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al theology, seek the new order of the state life, and that the difference makes the Socrates' tragedy.

Key words: *Euthyphro*; piety; justice;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theology